2025 年 2 月

2024 年春，吉美博物馆 (Musée Guimet) 在其常设展厅及注释牌上将“西藏 (Tibet)”一词替换为“喜马拉雅世界 (Monde himalayen)”（此处查看 SFEMT 的相关声明）。数月后，在其关于唐朝的临时展览中（2024 年 11 月至 2025 年 3 月），吉美博物馆系统性地使用中文音译词“Tubo”来指代藏人及世界各地的藏学学者在英语中所称的“Tibet Empire”，在法语中则称其为“Empire tibétain”（约 620-842 年）或简称为“Tibet”。在“中国·唐——一个多元开放的朝代 (La Chine des Tang : Une dynastie cosmopolite) (Paris: RMN, 2024)”的展出和名录中我们均可以看到，首字母大写的“Tubo”被用作民族称谓，如“Invasion du territoire Tang par les Tubos （吐蕃入侵唐领土）”（第 290 页）、“époque Tang, période Tubo（唐时代，吐蕃时期）”（第 68、72 到 73 页）、或“royaume de Tubo （吐蕃王国）”（第 80 页），亦或是作为形容词，例如“troupes Tubo（吐蕃军队）”（第 21 页）、“objet en or Tubo （吐蕃金器）”（第 68 页）、“culture Tubo（吐蕃文化）”、époque Tubo（吐蕃时代）和 style Tubo（吐蕃风格）”（第 72 页）（注意“Tubo”以首字母大写形式出现，不符合法语的正字拼写规则）。

作为汇集法国大学、法语世界或处于法国并专门从事藏学研究的学者协会，法国藏学研究协会 (SFEMT) 声明其基于两个原因拒绝接受使用“Tubo”一词，其一为语言原因、其二为历史原因。

首先，虽然唐代的中国历史资料确实使用“吐蕃”二字指代吐蕃帝国，但是将其读作“tǔbō”是不准确的。“tǔbō”作为现代的读音早在 1915 年就被汉学家保罗·伯希和 (Paul Pelliot) 认定为不合时代。他证明该二字在唐代汉语中的正确发音应是“tǔfān”。著名的汉语语言学家蒲立本 (Edwin George Pulleyblank) 和柯蔚南 (Weldon South Coblin) 在更近代的出版物中（分别为 1992 和 1994 年）强化了伯希和的论点。因此，在指代和引用中国历史资料时，学者们习惯使用“Tufan”而不是“Tubo”。
因此，将“Tufan”读作“Tubo”似乎充其量只是由于缺乏历史语言学知识，但其背后往往具有政治考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种读法被用来支持一种虚假的词源学联系，试图将藏语指代“Tibet 西藏”的原名 བོད (bod)与中文发音“Tubo”联系起来。

在当前吉美博物馆的展出中，使用“Tubo”作为音译似乎并非由于简单的语言或历史原因。唐朝周围的其他帝国有时也以其被西方普遍接受的名称来称呼（如“日本 Japon”、“波斯 Perse”、“朝鲜 Corée”、“突厥 Turcs”）。若是用中文名称来称呼它们，其后会附加被普遍接受的现代名称，例如“东突厥 Tujue (Turc) 汗国”（第 49 页）或“新罗 Silla (Corée) 王国”（第 58 页），而作为邻国的吐蕃帝国则没有得到此待遇。

其次，吉美博物馆名录的表述中，尤其是“唐代·吐蕃时期”的表述被用作描述来自吐蕃帝国朝廷的物品，暗示“吐蕃 (Tubo) ”是唐朝的一个时期，因此是唐帝国的一部分。然而，藏汉史料却证明事实并非如此。例如唐朝的官方历史《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均有几章专门讲述吐蕃帝国及其王朝、政治制度和与唐帝国的军事冲突。公元 763 年 11 月，吐蕃帝国占领了唐朝首都长安数周，其新的统治者在由藏人选定的官员的陪同下就任，象征着军事冲突的顶峰。这些史料还提及，早在公元 634 年两国朝廷之间就建立的外交关系，互派诸多使团（其中数个来自唐朝，每年向吐蕃帝国朝廷进贡），两场联姻，并签署几项和平协议。这些协议，例如著名的刻在拉萨唐蕃会盟碑上于公元 822 年签订的唐蕃会盟条约，不仅规定了吐蕃帝国和唐帝国统治者的主权仅限于各自的帝国内，更明确了两国领土之间的正式边界。
吉美博物馆决定在其展览和相关出版物中省略对吐蕃帝国的任何明确提及表明它否认吐蕃帝国的存在和独立性。此外，使用“Tubo”导致非专业的公众无法清楚地了解唐朝时期的地域背景。这一选择也不反映当代学术界的普遍立场，即广泛使用“吐蕃帝国 (Empire tibétain) ”和“西藏 (Tibet) ”等术语，揭露了博物馆对学术界长期以来对吐蕃帝国的研究缺乏了解或兴趣。